

广东马冈女子刻书考索

黄国声

在漫长的中国雕板印刷史上,女子刻书只是个特殊出现过的现象。正是这一鲜见的现象,打破了男性刻工长期垄断的局面,构成中国印刷史上多姿多彩的一页。近代学者已对女子刻书加以注意,但大多只限于一鳞半爪的介绍而缺乏深入的考察探讨。时人张秀民先生所著《中国印刷史》网罗甚广,考述精详,是部权威性的著作。但该书对于女子刻书的现象也只有简略的介绍。这恐怕是由于文献资料不足,又没有人对此作过研究的缘故。广东顺德县的马冈是国内几个存在过女子刻书的地区之一,有着长期的刻书传统和业绩。笔者乃留意现存的马冈刻本和有关文献,从中理出端绪。此外,又专程前往马冈访问根寻。综其所得,爰为短文介绍,冀或能补充雕板印刷史中的未备。

我国的女子刻书,大抵出现于清代。金武祥《粟香随笔》卷四谈及女子刻书情形云:“书板之多,以江西、广东两省为最。江西刻工在金溪县之许湾,广东刻工在顺德县之马冈。”而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卷七则谓:“湖南永州亦多刻书女工。”可见清代女子刻书集中在南方的江西、湖南、广东三地。其中赣、湘二省,文献记述较为疏略,情况难明。广东马冈则较受注意,如阮元创办的学海堂,即曾以咏马冈刻书为诗题,作为馆课。后来这些诗被选收入《学海堂集》中。咸丰间,郭汝诚修《顺德县志》则有较详细的叙述:“今马冈镂板几遍艺林,妇孺皆能为之。男子但依墨迹刻画界线,余并女工。故

价廉而行远。近日苏州书贾往往携书入粤，售于书肆，得值则就马冈刻所欲刻之板。刻成未下墨刷印，即携旋江南，以江纸印装，分售海内，见者以为苏板矣。”这段记载概述了马冈刻书的情况，但对于具体的制作，经营方式，刻印过的书籍等等仍没有介绍。

就笔者所涉及的文献来看，马冈的女子刻书始于何时，现尚难以确考。不过，乾隆十五年重修的《顺德县志》还未见提到过刻书的事，而现存最早的马冈刻本为嘉庆二年刻的《诗经小学》。因此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即已开始刻书业务了。此后，广州书坊业繁荣发展，带动了马冈刻书剧增，直到清末，前后数十年长盛不衰。如此现象，的确值得我们重视和探究的。

从现存的刊本来看，马冈先后出现过的刻字铺号和刻本情况如下：

冯裕祥 嘉庆二年刻《诗经小学》四卷，卷首有嘉庆二年臧辅堂序。序后另行题“顺德胡垣表写样，冯裕祥镌字”。

梁体元 嘉庆十五年刊《花隐诗集》八卷，每卷首叶中缝均题“马冈梁体元刊刻”。

冯配珍 嘉庆二十三年刊《玉峰诗钞》十六卷，卷首谭氏序后另行题“马江冯配珍刻”。（按：马冈人士有为简单易写而写作马江的，近世犹然。）

冯学镌堂 咸丰六年广州味经堂重镌《圣谕像解》，扉叶背面题“广州味经堂书坊重镌藏板装印”。书末题“马冈冯学镌堂刊”。

冯怀香堂 咸丰中刊《读杜姑妄》三十二卷。作者自跋云：“（刻）板本在马冈之冯怀香堂，其处浩劫屡经，而吾此书独无恙。”

冯继善堂 清末广州翰文堂刊《详订古文评注全集》十卷，卷首题“粤东顺邑马冈乡冯继善承刊”。卷终有大字牌记“粤东顺邑马冈冯继善承接刊”。又清末刊《校正四书补注备旨》十卷，亦题“顺德冯继善刊”。据马冈冯汝先生云：冯继善堂在马中村，主人冯姓。

冯积厚堂 宣统二年广州福芸楼刊《重校四书备旨补注附考》十卷，其《上论》卷一、二，《下论》卷三之首叶首行均题“顺邑马冈冯

积厚堂承刊”。

李应掌 宣统间佛山文华阁刊《声律启蒙撮要》二卷，卷首题“顺邑马冈李应掌承刊”。

琢文堂 据冯汝先生介绍：铺在马北村，主人李姓。

以上这些只是马冈刻书中的一部分。实际上，广州、佛山都有许多书坊和私人委托马冈刻过书，只是出于委托者的要求，没有在书上刻题铺名，难以确认。汪宗衍先生《清代女子刻书》一文说到：“粤中刻书若《皇清经解》、《广雅丛书》、《粤雅堂丛书》等大部头以至零星小种，无不为马江女子所刻者。即江浙之版本学者如黄丕烈之《士礼居丛书》，亦有一二种称为刻于药洲，当出马江女子之手。盖广州刻工虽稍逊于江浙，而刻字之费较廉也。”现存的《皇清经解》等书均为广州刻印，其未见有马冈刻书铺的题名，恐亦出于上述的原因。汪先生的父亲兆镛是学海堂弟子，清末的著名学者，所与交往均粤中名宿。宗衍先生本人熟精广东掌故，多聆故老遗闻，文中所说的情况，当必有据。

马冈是位于顺德县城南五公里处的一座山冈。其南面为容桂小道，北临顺德支流，水路交通十分便利。它在明代中期开始建村，分为马东、马南、马西、马北、马中五片，因五村环绕山冈，形状似马而得名。与县城近在咫尺，而县城有定期航船（粤人统称之为“渡”）直达广州及佛山，朝夕可至。这一有利的交通条件，对马冈刻书业的发展，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。笔者于1991年专门到马冈访问，得当地人士冯添业先生介绍，与他的父亲冯汝老先生详谈，获得许多可贵的资料。冯老时年八十二岁，身体健康，思路清晰。据他介绍，当地的女子刻书不知始于何时，但直到民国初年仍然零星存在。其中以马中、马北两村业此者为多，且以冯姓的人为主。至于马南、马东则没有刻书的。尤其马南为余姓聚居，较为富裕，自宋代以来多为读书取功名之士，明清二代，仕宦尤多，所以该村妇女没有刻书的。一般刻书者多为二十至三十岁的妇女，也有年轻姑娘，他们略识字或全不识字，但心灵手巧，能够依样雕刻，纤毫不爽。他年轻时

曾见母亲及两个妹妹替马北村的琢文堂刻书。当日刻书用的工作台、木凳、竹编工具篮子,现仍保存完好。书板刻好后,交回琢文堂,由该堂通过定期航船运到广州,交给书坊。回程则带回书坊交托新的书稿。村中女刻工都是分散在各家各户,在家中雕刻。至清末,广州的书坊多用铅印代替雕板,就只有日历、通书、木鱼书等仍继续交由马冈刻制。冯老本人也因受到村中及家庭刻书的影响,年青时曾到广州西关大观桥的广雅印务局做印刷工作。

此外,笔者又到马中村访问冯继善堂主人的遗孀刘老太太。据她介绍:自己不识字,只是代丈夫管理刻字铺的事务,所述经营情况与冯汝先生的介绍略同。她家原存有书板,因年代久远,已废弃无存了。又据顺德县方志办公室张解民副研究员介绍,李应掌仍有后人在国外居住,间或回马冈探亲,其人尚能缕缕忆述先人业务情况。马冈的刻书世家本还存有一些书板,但在文化革命期间遭到销毁。偶有幸存的,则已渐归朽坏,其后在人们改建房屋时作为废物处理掉了。

从以上情况可知,刻字铺是一个重要的角色。刻字女工是分散的,没有业务经营的能力,不可能与外地书坊建立业务关系。刻字铺则作为经营者担负起承接业务,交收书板的工作,对于马冈刻书业的顺利运作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。现存刻本上常见的某某堂承刊、承接刊字样,而鲜见刻工的题名,正好反映了它的经营特点。《栗香随笔》和《顺德县志》所说的“男子但依墨迹刻画界线,其余女工雕镂”的情况,可能是由刻字铺的男工或店主将界线先刻好在板上,然后分发各家女工刻制,以收工速之效。

马冈女子刻书,历来毁誉参半。誉者称其工速价廉,故能行远。毁者病其讹误过多,质量不佳。但如果我们细加考察,便不难发现所誉固然不虚,所毁则未免失实。试想苏版书素号精良,享誉海内,倘若马冈刻工不良,书贾又怎能用它来冒充苏版书?徐珂《清稗类钞·工艺类·妇孺刻书板》说:“湖南永州人民类以剗为业,妇孺且有从事者,牧牛郊野,辄手握铅槩,倚树鏤之。广东顺德县之手

民，率系十余岁稚女，价廉工速，而鲁鱼亥豕之讹误，则尤甚于湖南。”其论断是经不起推敲的。马冈女工世代相传，技艺纯熟，已具有专业化的味道。况且备有工作台及相应工具，安坐家中专心雕刻，其质量又怎会比“牧牛郊野”，“依树镌之”的永州刻板还差？徐珂所云，恐是未作实际考察，仅得之传闻而已。当然，作为刻书业，其产品自必有档次之分，从现存刻本看，也确有粗劣的大路货存在。大抵民间用书，普通读物等大路货，刻工就较为粗糙。如《声律启蒙撮要》是启蒙读物，恐是工价较低，所以字体板钝，雕刻粗糙。可取之处是极少错字。至于档次较高的书，则质量迥别，例如《花隐诗集》，书品宽大，字体仿灵飞经，秀雅悦目，刻得劲利优美，毫不逊色于私刻精品。又如《圣谕像解》一书，版面疏朗，字体秀劲，书品亦佳；所附图像浅线条道美，全书文字并无错讹。这是封建时代宣传讲解皇帝训言的书，万万不能错漏。倘若马冈刻工马虎，刊行者的广州味经堂书坊是断不肯冒此大风险，委托他们刻板的。至于私人委托马冈刻的书，由于工价较高，要求较严，自然亦刻得精善而鲜错讹了。

刻工的名字，在马冈刻书中很少出现，这是由于已有刻字铺题名，刻书女工无足轻重，故不见于书题。据冯汝先生说，他的亲属刻工也从未有题名于书板上的。从现存刻本上，仅见有冯裕祥、冯配珍二人，而冯裕祥还可能是男性。马冈妇女刻书知名于世，又延历数十年之久，却未能藉此留其姓氏鸿爪，亦属憾事。

马冈刻书，早在清道光间已为人知，可惜文献语焉不详，评价亦欠允当，及今百年，尚未有深入考索而彰显之者。我不揆浅陋，尝欲为文一探。适美国包筠雅博士专程赴马冈考察刻书历史，便道来访，乘询一切。仓卒间言有未尽，爰为此文以详述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